

当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 宗教话语与选举动员

——基于大数据的话语分析*

张楚楚 肖超伟

内容提要:近年来,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日益偏好使用宗教话语开展选举动员。本文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既非用于回应虔诚基督教选民的宗教诉求,也非宗教冲突加剧引起本土宗教神圣性反弹的结果。基于对欧洲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近十年来竞选宣言的大数据话语分析,本文发现,各党在对待特定宗教与世俗主义议题的态度上有所差异,但其宗教话语构建呈现出较为相似的规律与逻辑。各党宗教元素的使用并不关乎宗教本身,而是呈现出鲜明的政治目的与工具色彩。欧洲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制造包括基督徒与世俗主义者在内的欧洲原住民同穆斯林移民之间的对立关系,是其区别于主流政党、彰显批判性与反叛性的“抗议式”选举动员的策略。

关键词:右翼民粹主义 宗教话语 选举动员 政党政治 大数据

继英国“脱欧”后,随着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跃升为法国第一大反对党、北方联盟(Lega Nord)在意大利政坛的强势崛起,以及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成为德国的第三大政治势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家族,正在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崛起为一支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

欧洲政治研究学者凯塞尔(Stijn van Kessel)指出,凡是将“人民”视为无差别群

* 本文为2022年度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揭榜挂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学科交叉与交叉科学发展的国际动态、趋势与最新前沿”的研究成果。感谢“中东研究青年学者工作坊”与“五角场学派”的学术支持,也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包刚升、刘宏松、刘中民、孙德刚等学者的宝贵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张楚楚构思了此项研究,同时负责文献综述,并组织了数据收集工作;肖超伟设计了该项研究的实证策略,承担了数据分析工作。两位作者均参与了文章的写作及研究结果的讨论,对文章做出了同等学术贡献。

体,将自身描述为捍卫人民主权的反建制政党均可被视为民粹主义政党。^①按照英国政治学者祖礼阿尼洛(Mattia Zulianello)的类型学划分与统计,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民粹主义政党中占据主体地位(68.2%)。^②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包含“右翼”与“民粹主义”的双重特征,在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谱系中有着特定的空间位置。作为一种特殊的政党家族,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强调“人民”的内在整体性和一致性,在民族主义、全球化、多元文化等议题上持保守立场,试图解构公共理性的逻辑,建构非理性的直观,并以泛道德主义来解构现存问题,主张实现“激进民主”目标。^③荷兰学者穆得(Cas Mudde)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总结为独裁主义、民粹主义与本土主义。^④尽管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具有某种价值观上的保守性,但究竟此类政党具有多大程度的保守性、其价值观与西方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保守政党存在何种异同等问题尚未在学界得到充分的研究。

事实上,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异军突起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此类政党与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不同,大多并无深厚的宗教背景与传统,却日益偏好采用宗教话语开展政治动员。近年来,法国国民联盟不仅反复强调法国具有深厚的宗教根基,还推动各地于圣诞节庆典时在公共场所再现耶稣降生的场景。^⑤意大利北方联盟曾于米兰大教堂前举行竞选集会,期间该党主席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高举福音书,誓言“将实施宪法所预见但很多人所忽视之事,并通过遵奉神圣的福音书所包含的教义来实现”。^⑥

尽管宗教话语构建是整个右翼民粹主义的政党动员策略中的一部分,但厘清这一政党家族的宗教话语建构逻辑是探究其价值观与思想特征的重要抓手。笔者认为,面对上述此类政党日益偏好运用宗教话语的西方政治新现象,有必要重新审视宗教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传统上,有关宗教如何影响现代选举政治的研究存在两种视角:一种探讨社会上出现的某种宗教需求,以及政党、政治组织等政治行为体如何回应

^① Stijn van Kessel,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Agents of Discontent?*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13, pp.71-72.

^② Mattia Zulianello, "Varieties of Populist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in Europe: From State-of-the-Art to the Application of a Novel Classification Scheme to 66 Parties in 33 Countrie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55, Issue 2, 2020, pp.327-347.

^③ 佟德志:《解读民粹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第23页;刘勇:《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类型划分、行动策略、治理路径》,载《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50-57页;贾文华、季哲忱:《欧洲左中右翼民粹政党的政治殊求——基于选民投票偏好的数据解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2期,第127-128页。

^④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93.

^⑤ Le Figaro, "À l'Approche de Noël, la Bataille des Crèches Reprend au FN," December 14, 2016; La Croix, "Crèche Vivante Interrompue à Toulouse: Que S'est-il Passé?" December 16, 2019.

^⑥ Marco Cremonesi, "Salvini, dal Dio Po al Rosario: La Svolta Mistica in Piazza Duomo a Milano," <https://www.corriere.it/elezioni-2018/notizie/salvini-dio-po-rosario-svolta-mistica-piazza-duomo-milano-7e485394-198a-11e8-9cdc-0f9bea8569f6.shtml>.

此种需求;另一种则强调宗教在政治生活中的工具意义,将宗教元素视为一种动员策略。换言之,在后一种视角下,无论是选民的选举行为,还是政治行为体的动员行为,其中出现的宗教元素往往并非关乎宗教本身,而是服务于世俗与政治目的。当前,少量注意到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宗教动员的著述大多着眼于第一个视角。

许多学者承袭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伯格(Peter Berger)等学者对“世界处于世俗化进程中”这一经典理论的反思,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使用宗教话语置于“后世俗社会”的语境中解读。按照英国宗教政治学者德汉纳(Daniel Nilsson DeHanas)与社会学者史特林(Marat Shterin)的说法,右翼民粹主义带有某种神圣性的色彩,通过采用宗教符号与隐喻,满足人们的归属感与道德感等需求。^① 美国政治学者明肯贝格(Michael Minkenberg)与社会学者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从文化多元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宗教语言逐渐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世界人口结构中族群宗教异质性增强的结果。^② 一些学者据此研究宗教因素在政党竞争与政治动员中发挥的作用,并指出继世俗主义与反世俗主义、基督教的宗派差异之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信仰分歧逐步成为欧美国家第三个维度上的宗教分化,并成为影响选民选举行为的重要决定性因素。^③

本研究试图系统性地探究如下核心问题: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是否是欧洲国家宗教复兴或者宗教冲突加剧的结果? 欧洲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缘何使用宗教话语开展选举动员? 宗教因素在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抬头的潮流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 笔者发现,强调宗教实际意义的研究视角不足以涵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使用宗教话语的全部内在动力。本文基于实证分析指出,此类政党构建宗教话语的最终指向在于抨击主流政党与精英建制,进而实现“抗议式动员”的目的。在话语构建的过程中,宗教元素的工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本文尝试为理解右翼民粹主义提供新的思路,并基于欧洲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近十年来的竞选宣言,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尤其是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针

^① Daniel Nilsson DeHanas and Marat Shterin, “Religion and Rise of Populism,”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Vol.46, No.3, 2018, pp.177-185.

^② Michael Minkenberg, “Religion and the Radical Right,” in Jens Rydgre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Radical Right*, Vol.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366-393; Rogers Brubaker,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Civilizationism: The European Populist Mo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40, No.8, 2017, pp.1191-1226.

^③ Jakob Schwörer and Belén Fernández-García, “Religion on the Rise Agai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Religious Dimensions in Election Manifestos of Western European Parties,” *Party Politics*, Vol.27, Issue 6, 2021, pp.1160-1171, DOI: 10.1177/1354068820938008.

对现有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研究中较为缺乏的宗教话语进行系统性探究,以期丰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研究的研究对象、数据与方法,深化对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这一西方新崛起力量的认识,为把握欧洲当代政治转向提供智力支持。

一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构建:一种宗教复兴的潮流?

按照 19 世纪以来兴盛的世俗化理论,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全球化与个性化消费文化的兴起,宗教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并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黯然退场。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督教民主政党在欧洲政坛的迅速崛起、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基督教右翼运动的风起云涌,以及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代表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中东北非与东南亚等地区的异军突起,引发学者从不同角度质疑或修正经典世俗化理论。

一种日益流行的观点认为,现代化并不必然导致政教分离。此种观点批判世俗化理论框架将宗教构建为现代性的“他者”,并强调宗教迄今仍在公共领域中发挥一定的功能与作用。^① 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罗肯(Stein Rokkan)在研究现代政党体系时,认为宗教分化与阶层差异共同构成了现代政党的成因,并深刻塑造着选民的选举偏好。二人将宗教分化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国家主要教派与少数教派之间的分化,例如英国国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分化;其二为崇尚政教分离和现代价值观的世俗主义者,以及拥护传统宗教建制与价值观的反世俗主义者之间的分化。^② 按照这一思路,在探讨当代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动员时,一些学者认为,宗教分化至今依然存在,但各国传统的基督教民主政党在长期参与竞争性选举的过程中,为争取更广泛的选民基础而呈现温和化与实用主义倾向,在涉教议题上与世俗保守政党的立场分歧显著缩小,因而越来越难以满足基督教选民维护传统宗教建制与价值观等需求。^③

^① David Martin, “Towards Eliminating the Concept of Secularization,” in Gould Julius, ed., *Penguin Surve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enguin, 1965, pp.169-182; Jeffrey K. Hadden, “Toward Desacralizing Secularization Theory,” *Social Forces*, Vol.65, No.3, 1987, pp.587-611.

^②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An Introduction,” 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The Free Press, 1967, pp.1-64; Stein Rokkan, *Citizens, Elections, Parties: Approaches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ocesses of Development*, David McCay, 1970.

^③ 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参见 Stathis N. Kalyvas and Kees van Kersbergen, “Christian Democrac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No.13, 2010, pp.183-209; Michael D. Driessen, *Religion and Democratization: Framing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Muslim and Catholic Socie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62-134.

鉴于目前日益偏好构建宗教话语的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举基础迅速扩大,以及基督教民主政党的支持率大幅下滑的现状,^①有理由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选民的宗教虔诚程度越高,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愿就越强。

面对宗教的复兴及其对政治的影响,除了质疑世俗化理论的基本假设,并探究宗教神圣性的独特功能与宗教价值观的延续,另一种观点试图修正世俗化理论。后者并不否认随着现代化和理性化的推进,宗教或将退出公共空间,但认为当现代化发展滞后或者遭遇某种挑战时,极易引发宗教神圣性的反弹与重塑。^②不少学者由此将当代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采用宗教话语归结于当地族群宗教异质性提高的背景下外来信仰体系,特别是伊斯兰教对本土主流信仰体系冲击的结果。^③鉴于近几十年来欧洲国家穆斯林人口占比的持续升高,^④有理由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宗教分裂程度越高的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就越高。

本研究基于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 ESC)2018年的民意调查数据来验证第一个假设。笔者采用祖礼阿尼洛的类型学标准,选取至少存在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欧洲国家,并将选民在最近一次的全国选举中投票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计为“1”分,将投票给其他政党或没有投票计为“0”分。

尽管“宗教选民”(religious voters)的讲法常见于政治学著述,但由于这一群体内部具有异质性与复杂性,“宗教选民”与“非宗教选民”(non-religious voters)或者“世俗选民”(secular voters)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为验证假设1,笔者将是否在行为上践行宗教活动与生活方式作为信仰虔诚程度的主要测量标准,例如是否高频参加礼拜、读经等宗教仪式活动。本文将ESC数据库中受访者关于教堂出席率的回答作为一个自变量,且仅保留基督教受访者的回答,剔除非基督教受访者的回答。笔者将数据库中教会出席率的打分进行逆向处理,分值“1”表示“从不前往教堂”,“2”表示“偶尔前往”,“3”表示“仅在特别的宗教节日前往”,“4”表示“每月至少一次”,“5”表示“每周一次”,“6”表示“超过每周一次”,“7”表示“每天”。

^①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基督教民主政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政治影响力大不如前。参见 Fraser Duncan, “A Decade of Christian Democratic Decline: The Dilemmas of the CDU, ÖVP and CDA in the 1990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41, No.4, 2006, pp.469-490。

^② Pippa Norris and Ronald Inglehart,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③ Steven Kettell, “Religion, Modernisation and Secularisation,” in Jeffrey Haynes,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to Religion and Political Parties*, Routledge, 2020, pp.44-54。

^④ 2019年关于欧洲穆斯林人口预测的一项新研究,参见 Pierre Rostan and Alexandra Rostan, “When Will European Muslim Population Be Majority and in which Country?” *PSU Research Review*, Vol.3, No.2, 2019, pp.123-144。

为验证假设 2,笔者采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6 年穆斯林人口统计数据衡量各国的宗教分裂程度,并选取竞选宣言项目数据库(Manifesto Project Database,MPD)中最近一次全国选举中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数据衡量各党支持率。

笔者使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法,通过 SPSS 软件对选取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选民的宗教虔诚程度与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意愿,以及宗教分裂程度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仅为 0.101 与 0.132,表明两组变量均无显著相关关系。有趣的是,在穆斯林人口占比仅为 0.4%的匈牙利,2020 年以前的最近一次全国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高达 68.3%,远高于穆斯林人口占比分别为 8.8%与 6.1%的法国与德国(两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得票率分别为 13.2%与 12.6%)。^①

由此看来,虔诚的基督教选民并非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重要选举基础,后者的宗教话语动员未必是以回应前者的宗教诉求为目的。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受欢迎程度与欧洲国家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存在并不直接关联,因此,前者近年来日益使用宗教话语,并非宗教冲突加剧引起本土宗教神圣性反弹的结果。这些发现与主流看法并不一致。那么,为什么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日趋偏好采用宗教话语开展选举动员?这就需要学术界提供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二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构建:文本特征与叙事框架

(一)数据与方法

为探讨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采用宗教话语的行为逻辑,本研究针对欧洲各国 2010-2020 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竞选宣言开展大数据话语分析。

本文采用全样本数据,各政党的竞选宣言主要取自 MPD。^② 该数据库由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开发,包含 1945 年以来 50 多个国家中超过 1000 个政党的竞选宣言。同时,笔者采用政治文件档案数据库(Political Document Archive,PDA)作为补充,完善 MPD 数据库中没有包含的数据,从而丰富总样本数据库的全面性,并校准 MPD 数据

^① Pew Research Center, Europe's Growing Muslim Population, 2017, <https://www.pewforum.org/2017/11/29/europes-growing-muslim-population/>; Andrea Volkens et al., The Manifesto Data Collection, Manifesto Project (MRG/CMP/MARPOR), Version 2020b,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für Sozialforschung (WZB), 2020, <https://manifesto-project.wzb.eu/>.

^② Andrea Volkens et al., The Manifesto Data Collection, Manifesto Project (MRG / CMP / MARPOR).

库的信息,确保资源的可靠性。^①这一数据库由德国曼海姆大学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学者联合开发,收录了来自20个欧洲国家的选举宣言、联盟协议、政府声明等超过3000份政治文件。

大量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选举的功能及其对于选民和候选者的意义可能迥然相异,由此催生出不同的选举逻辑。^②为了避免政治制度因素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干扰,本文聚焦民主化程度较高的欧洲国家。笔者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发布的“2020年度全球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筛选出完全民主国家(full democracy)与缺陷民主国家(flawed democracy);^③然后按照祖礼阿尼洛的分类方法,确定这些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并在MPD与PDA数据库中获取各党2010-2020年的竞选宣言。如表2所示,本文的话语分析对象为欧洲25个国家33个政党的68份竞选宣言,共包含57659个准句子(quasi-sentence)。^④

尽管MPD数据库包含部分结构化信息,但并未对宗教相关主题进行编码,因此,这项研究主要采用MPD与PDA数据库提供的竞选宣言文本原始信息。笔者首先通过谷歌翻译软件将表3所列政党68份竞选宣言中的非英文文本转化为英文文本,然后请翻译团队进行人工校对;进而采用话语分析方法研究文本,并借助谷歌云深度学习平台,结合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分析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建构特征。

(二)词频统计分析

话语分析的要旨在于,通过对语句或语篇中词汇和语法等语言结构及语句间衔接关系的研究,厘清具体语境中语句的真实语义,并揭示话语的建构逻辑。^⑤这项研究提炼出文本中涉及宗教的重要词条,分析结果见表1。从各词条出现的频率来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竞选宣言中提到的宗教主要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各教派与犹太教。其中,“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出现的频率最高,超过“基督教(的)/基督教

^① Kenneth Benoit, Thomas Bräuninger and Marc Debus, “Challenges for Estimating Policy Preferences: Announcing an Open Access Archive of Political Documents,” *German Politics*, Vol.18, No.3, 2009, pp.441-454.

^② Steven A. Block, Karen E. Ferree and Smita Singh, “Multiparty Competition, Founding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Vol.12, No.3, 2003, pp.444-468; Ellen Lust, “Democratization by Elections? Competitive Clientelism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0, No.3, 2009, pp.122-135; Jennifer Gandhi and Ellen Lust-Okar, “Elec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2, 2009, pp.403-422.

^③ “Global Democracy Has a Very Bad Year,”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21/02/02/global-democracy-has-a-very-bad-year>.

^④ 包含一个信息或者一项陈述的语句被视为一个准句子,一个自然语句中可能包含多个准句子。MPD数据库采用准句子作为编码单元,本文研究沿袭此种编码方法。

^⑤ 蒋红柳:《语用学综观论: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应用》,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22页。

徒”的两倍,而“犹太教(的)/犹太人”“佛教(的)/佛教徒”等其他宗教则极少出现。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49%有关“基督教(的)/基督教徒”的表述出现在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Kereszténydemokrata Néppárt)组成的竞选联盟宣言,以及匈牙利尤比克党与瑞士人民党的独立竞选宣言中。作为基督教民主党派的竞选伙伴,前者偏好采用更多基督教元素并不意外。而尤比克党最初发源于匈牙利罗兰大学的保守基督教组织,^①自2003年建立起,便长期自我标榜为“一个爱国的、基督教的、保守的、关注社会事务的人民政党”,^②并一直将基督教元素作为其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石。瑞士人民党与基督教会或基督教团体的关联甚少,且初建时也极少流露出宗教情结。但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该党试图将选票基础由原先的新教徒选区扩展至过去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占据主导的部分天主教徒选区,并为了减少竞争劣势而显著增加了宗教话语宣传。^③相较于上述三个政党,其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竞选宣言对基督教提及的频次则明显偏少。不过,在上述三个政党与其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竞选宣言中,“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词条出现的频次并无明显差异。

表1 文本内容与宗教相关的重要词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基督教(的)/基督教徒 (Christianity/Christian)	82	伊斯兰主义 (Islamism)	19
天主教(的)/天主教徒 (Catholicism/Catholic)	11	清真寺 (mosque)	27
东正教(的)/东正教徒 (Orthodoxy/Orthodox)	4	宣礼塔(minaret)	3
基督教会/教堂 (church)	29	伊斯兰学堂 (Islamic school)	14
受难节 (Good Friday)	2	古兰经 (Koran/ Quran)	9

^① Human Rights First, “The Jobbik Party in Hungary: History and Background,” December 2015, <https://www.humanrightsfirst.org/sites/default/files/Jobbik-Party-Fact-Sheet-final.pdf>.

^② 参见尤比克的原则宣言, https://www.jobbik.com/declaration_of_principles.

^③ Daniel Bochsler, Sean Mueller and Julian Bernauer, “An Ever Closer Union? The Nationalis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Switzerland, 1991–2015,”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2, Issue 1, 2016, pp.33–34.

圣乔治节 (St George's Day)	2	伊斯兰教法 (sharia)	24
犹太教(的)/犹太人 (Judaism/Jewish/Jew)	7	伊玛目 (imam)	5
合乎犹太教规的(kosher)	2	合乎伊斯兰教规的(halal)	11
佛教(的)/佛教徒 (Buddhism/ Buddhist)	2	头巾/面纱 (headscarf/ hijab/veil niqab)	26
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Islam, Islamic, Muslim)	158	罩袍 (burqa)	19
伊斯兰化 (Islamization, Islamize)	13	圣战 (jihad)	17

注:表由作者自制。

由于宗教传统与人口信仰结构不同,欧洲各国对待基督教教派的态度有所差别。在受新教影响较大、新教徒人口比例较高的欧洲北部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常仅笼统地提及“基督教”,而较少表现出对不同基督教派别的关注,试图营造对基督教各派更为包容的形象。而在天主教传统较为深厚的意大利、波兰等国家,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会在竞选纲领中提及“天主教”,并指出天主教教义是该党重要的思想源泉。此外,在以希腊为代表的东正教占主导的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亦会重点强调维护东正教的价值观。不过,无论何种情况,此类政党对“基督教”的描述总体上较为模糊。除了多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竞选宣言中谈到“基督教会/教会”,只有个别政党提及受难节、圣乔治节等基督教节日,各党的竞选宣言中普遍缺乏有关基督教的其他重要词条,甚至连“圣经”“十字架”等常见的基督教象征都未见诸文本。这与欧洲基督教民主政党差异显著,后者的竞选宣言中常常提及十字架、基督教传统节日、以1517年宗教改革运动为代表的重要宗教事件等意向表达宗教情结。^①

然而,文本中有关伊斯兰教的象征却颇为丰富,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词条包括“头巾/面纱”“清真寺”“伊斯兰教法”等。由此看来,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不成比例的关注度构成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构建宗教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开展有关伊斯兰教的话语构建时,这些政党不仅反复强调伊斯兰教与穆斯林,而且试图辅之

^① 例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2017年竞选宣言、奥地利人民党2017年竞选宣言,取自MPD数据库。

以诸多宗教象征,勾勒出具象的涉教图景。但在开展有关基督教的话语构建时,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有限谈论基督教及其信徒,似乎仅仅将基督教作为一种抽象符号。

(三)情感分析

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本质上反映了欧洲社会的保守主义趋势,而在此问题上,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在思想观念上与各国保守主义思想力量,尤其与基督教民主主义的传统有着重叠之处。然而,尽管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基督教民主政党均宣扬对基督教价值观的维护,但不同于后者,前者的宗教话语构建存在“重伊斯兰教轻基督教”的现象,这是否说明这些政党并未出现崇尚传统价值观与宗教意识形态的趋势?换言之,是否这些政党构建宗教话语未必服务于反对世俗化与复兴基督教的目的?

为了更精确地考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及其构建宗教话语的目的,本研究采取了语义情感分析方法。为探究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是否具有反对世俗化的功能,本研究在考察此类政党对待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语义情感的同时,也试图考察其对待世俗主义的语义情感。此种研究方法又名文本倾向性分析,旨在分析文本所传达的对于产品、事件、主题等实体的情感、评价、态度等主观感受。^①研究通过深度学习令计算机判断文本对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的看法或评论是积极、消极或中性意见。

MPD 数据库中提供了有关各政党对待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主义、宪政主义等主题的语义情感分析数据结构。其分析路径是根据相关标准,通过计算每一份竞选宣言中赞同、褒扬相关主题的准句子在全文准句子总数中占据的百分比,作为积极情感指数;同时计算每一份竞选宣言中反对、贬低相关主题的准句子在全文准句子总数中占据的百分比,作为消极情感指数。鉴于数据库并未计算各党针对宗教与世俗主义的情感指数,本研究遵循相同的逻辑,采用表 2 所示的评判标准。笔者假定各党对待宗教本身、宗教建制与宗教观念的态度未必一致,因而从这三个维度入手,根据涉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高频词汇确定主题关键词。鉴于文本中缺乏与宗教建制相对应的世俗主义建制,本文仅探讨各党对待世俗主义本身与世俗主义观念的态度。笔者在文本中检索包含表 2 所列关键词的准句子,然后采用 TextBlob 包计算出每份文本对待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的积极与消极情感指数,测算出欧洲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近十年来对待三个主题的积极性情感指数与消极情感指数的平均数,进而用前者减去后者,得出

^① Bing Liu, *Sentiment Analysis and Opinion Mining*, Morgan & Claypool Publishers, 2012, p.6.

各党针对世俗主义的综合情感指数。为了便于比较,笔者对这些指数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综合情感指数为正数,说明政党对相关主题的态度为积极,且绝对值越大积极程度越高;反之则说明政党对相关主题的态度为消极,且绝对值越大消极程度越高。

表2 基督教、伊斯兰教、世俗主义语义情感指数的评判标准

主 题	评判标准	主题关键词
对待基督教的语义情感	对待基督教本身的语义情感	基督教(的)/基督教徒; 天主教(的)/天主教徒; 东正教(的)/天主教徒
	对待基督教建制的语义情感	基督教会/教堂; 教皇(the Pope); 神职人员(clergy)
	对待基督教观念的语义情感	道德准则(morality); 家庭(family); 婚姻(marriage)
对待伊斯兰教的语义情感	对待伊斯兰教本身的语义情感	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对待伊斯兰教建制的语义情感	清真寺; 伊玛目; 伊斯兰教法
	对待伊斯兰教观念的语义情感	头巾/面纱; 罩袍; 吉哈德
对待世俗主义的语义情感	对待世俗主义本身的语义情感	世俗的/世俗主义 (secular/secularism)
	对待世俗主义观念的语义情感	离婚(divorce); 未婚同居(cohabitation/ PACS); 性少数群体(的)(LGBT/ same-sex/homosexual); 体外受精(vitro fertilization); 人工流产(abortion); 安乐死(euthanasia)

注:表由作者自制。

表 3 显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普遍对基督教的态度颇为积极,而对伊斯兰教的态度相当消极。这表明,这些政党对于两种宗教的叙事模式带有明显的主观感情色彩,旨在构建某种特定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意象,而非展现两种宗教的真实样貌。而对于两种宗教一正一负的语义情感表达,延续了传统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中“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核心内涵。^① 此种话语特征与欧洲基督教民主政党形成鲜明对比,为右翼民粹主义所特有的叙述模式。以德国为例,尽管基督教民主联盟与选择党均宣扬基督教价值观,但前者提出“在我们的学校里,宗教教育必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根据宪法,我们‘不仅倡导在学校开展基督教教育’,还倡导在学校进行伊斯兰宗教教育”,^②并宣称“长期以来,居住在德国的穆斯林凭借他们的思想和工作为我们国家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因此他们属于我们的社会”。^③ 此类话语呈现出对伊斯兰教极大的包容度与积极情感。相比之下,德国选择党表示:“宣礼塔和伊斯兰教唤礼与基督教会、犹太社区和其他宗教社区在现代推行的宗教宽容共存相矛盾”,^④充斥着对伊斯兰教的消极情感。

表 3 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世俗主义情感指数

国 家	政 党	基督教 情感指数	世俗主义 情感指数	伊斯兰教 情感指数
奥地利	自由党(Frei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s)	3.122	0.785	-4.970
比利时	弗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	1.825	1.392	-4.726
保加利亚	“阿塔卡”联盟(Атака)	0.124	0.215	-0.236
	沃利亚运动(Движение Воля)	0	0	0
	重塑保加利亚党(Презареди България)	1.730	0	0
克罗地亚	斯拉沃尼亚和巴拉尼亚民主联盟 (Hrvatski demokratski savez Slavonije i Baranje)	2.482	0	0
捷克	自由与直接民主运动 (Svoboda a přímá demokracie)	1.235	0.126	-2.134
丹麦	人民党(Dansk Folkeparti)	0.626	0.458	-1.227

①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②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2013 年竞选宣言,取自 MPD 数据库。

③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2017 年竞选宣言,取自 MPD 数据库。

④ 德国选择党 2017 年竞选宣言,取自 MPD 数据库。

爱沙尼亚	保守人民党(Eesre Konservatiivne Rahvaerakond)	0.592	0	-0.653
芬兰	蓝色未来(Sininen tulevaisuus)	2.773	1.382	-2.909
法国	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	1.293	2.791	-3.472
德国	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3.563	2.398	-4.125
希腊	独立希腊人(Ανεξάρτητοι Έλληνες)	3.252	0	-2.967
匈牙利	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 (Fidesz-Magyar Polgári Szövetség)	3.940	0	-1.053
	尤比克党(Jobbik Magyarorszáért Mozgalom)	3.324	0.483	-1.782
意大利	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	1.328	0.475	-2.526
	北方联盟(Lega Nord)	3.785	0.537	-4.675
立陶宛	秩序与正义党(Tvarka ir teisingumas)	1.421	0	0
卢森堡	选择民主改革党 (Alternativ Demokratesch Reformpartei)	2.897	3.520	-3.483
荷兰	民主论坛(Forum voor Democratie)	0.795	1.365	-0.955
	自由党(Partij voor de Vrijheid)	0.546	1.362	-2.072
挪威	进步党(Fremskrittspartiet)	0.296	0.379	-0.474
波兰	“库奇兹”运动(Kukiz'15)	0	0	0
	法律与公正党(Prawo i Sprawiedliwość)	1.635	0	0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激进党(Српска радикална странка)	0	0	0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民族党(Slovenská národná strana)	1.586	1.183	-1.928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民族党(Slovenska Nacionalna Stranka)	0.783	1.389	-1.897
西班牙	声音党(Vox)	2.673	1.853	-2.872
瑞典	瑞典民主党(Sverigedemokraterna)	1.379	0.789	1.783
瑞士	人民党(Schweizerische Volkspartei)	2.918	0.952	-2.459
	日内瓦公民运动(Mouvement Citoyens Genevois)	1.625	0.795	-1.835
	提契诺联盟(Ticino League)	0	0	-3.527
英国	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	1.223	1.902	-2.784

注:表由作者自制。

1.表中所列政党为欧洲完全与缺陷民主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2.保加利亚的“沃利亚运动”原名为“自由联盟”。2012年更名为“今天党”,2016年更名为现用名;“重塑保加利亚党”(Презареди България)原名为“无审查的保加利亚党”(България без цензура),2017年更改为现用名;法国“国民联盟”原名“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2018年6月更改为现用名。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待伊斯兰教的情感指数绝对值大于基督教情感指数。对待两种宗教的情感指数的绝对值差异一方面是由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大多将宗教话语构建的重心放在抨击与批评伊斯兰教上,而将褒扬基督教置于次要地位;另一方面则基于各党对待一切有关伊斯兰教的事物基本上持消极意见,但一些政党对待基督教信仰体系的语义情感颇为微妙。尽管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均表示拥护基督教及其信徒,多数政党也高度重视抽象意义上的传统基督教道德准则,但各党在对待传统基督教建制的问题上分歧显著。以匈牙利尤比克党、独立希腊人、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为代表的少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高度赞扬基督教会,认为教会与基督教信仰一样,共同构成本国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石,一些政党还强调保护教会的财产与文物。但更多政党公开表达对教会的不满,例如挪威进步党表示“不接受教会(为移民难民们)提供庇护”,^①德国选择党呼吁“停止从税收收入中拨款支付主教等教会代表的报酬”。^②此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国政教关系安排的不同。^③

更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多数政党对待世俗主义的情感指数绝对值低于基督教,但大约三分之二的政党对待世俗主义持积极情感,其他政党几乎均为中立。这说明许多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离婚、未婚同居、性少数群体、人工流产等话题上的态度并未遵循传统的宗教价值观。在各政党中,法国国民阵线对待世俗主义的语义情感最积极。这一现象可以归因于世俗主义在法国宪法秩序与政治生活中的根深蒂固。^④卢森堡、荷兰、德国、英国等其他欧洲西部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普遍比欧洲东部国家同类型政党呈现出更高的正面情感。其中,卢森堡、荷兰等低地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甚至提出“我们捍卫同性恋”“应当承认同性恋伴侣在抚养孩子时的‘事实父母地位’”^⑤等口号。此种差别与各国的法律平权状况密切相关。鉴于西欧国家率先开展性少数群体的立法保护运动,且当前西欧社会与法律对性少数群体的包容度普遍高于中东欧国家的事实,两者出现语义情感差异并不令人意外。这也反映出欧洲各国不同政治文化传统对右翼民粹主义对象和话语的影响。

有趣的是,将近一半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竞选宣言中宣称自身同时为基督

① 挪威进步党 2017 年竞选宣言,取自 MPD 数据库。

② 德国选择党 2017 年竞选宣言,取自 MPD 数据库。

③ Tobias Cremer, “Nations under God: How Church-State Relations Shape Christian Responses to Right-Wing Populism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ligions*, Vol.12, No.4, 2021, p.254.

④ Alois Müller, “Wie laizistisch ist Frankreich wirklich? Von der kämpferischen zur offenen Laizität,” in Manfred Brocker, Hartmut Behr and Mathias Hildebrandt, eds., *Religion — Staat — Politik*,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3, pp.69–82.

⑤ 卢森堡选择民主改革党 2013 年竞选宣言,取自 MPD 数据库。

教与世俗主义的捍卫者,比如2012年独立希腊人声称:“我们相信东正教的价值和永恒,承认它对国家的贡献,同时我们保证每个公民的世俗主义和个人自决权”。^①又如2017年德国选择党表示:“选择党致力于引领基于基督教、古典主义、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价值观的德国文化”,并且坚决捍卫“国家法律优先于宗教诫条”与“世俗国家”。^②事实上,德国选择党领导人威德尔(Alice Weidel)并不讳言自身为女同性恋者。不同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世俗的”或“世俗主义”词条极少见诸同一时期欧洲基督教民主政党的竞选宣言。

通过语义情感分析,不难发现,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待伊斯兰教的负面情感高度一致,但是在对待基督教和世俗主义的语义情感上则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许多政党表现出既支持作为一个抽象符号的基督教,又反对传统基督教建制,而且在诸多议题上赞同世俗主义观念的矛盾现象,表明这些政党构建宗教话语并不代表着反世俗化与复兴基督教的趋势。这也印证了法国政治学者罗伊(Olivier Roy)对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宗教观的一个论断:“他们将(抽象而整体的)基督教世界置于(具体的)基督教教义之上”。^③

(四)语义网络分析

为了厘清诸多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存在支持基督教与世俗主义观念的“双重话语特征”背后的逻辑,笔者借助于语义网络分析法,探究这些政党构建宗教话语的意图。此种方法可以直观地对词条之间的层次关系、亲疏程度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话语构建的模式与内容。

笔者首先通过 tensorflow 框架下的词向量算法,分别用欧几里得空间距离计算与“基督教(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世俗的/世俗主义”关系最密切的关键词,进而生成由这些词条组成的语义网络图。如图1所示,该图揭示了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所嵌入的文本语境与语境内容之间潜在关联。

(1)基督教、世俗主义与伊斯兰

有趣的是,图1显示,同基督教与世俗主义密切相关的词条颇为接近,说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构建基督教话语与世俗主义话语的逻辑高度相似。二者的高关联词条包含三类重要词簇:一是给二者定位的词簇,例如将基督教定位为“身份”,将世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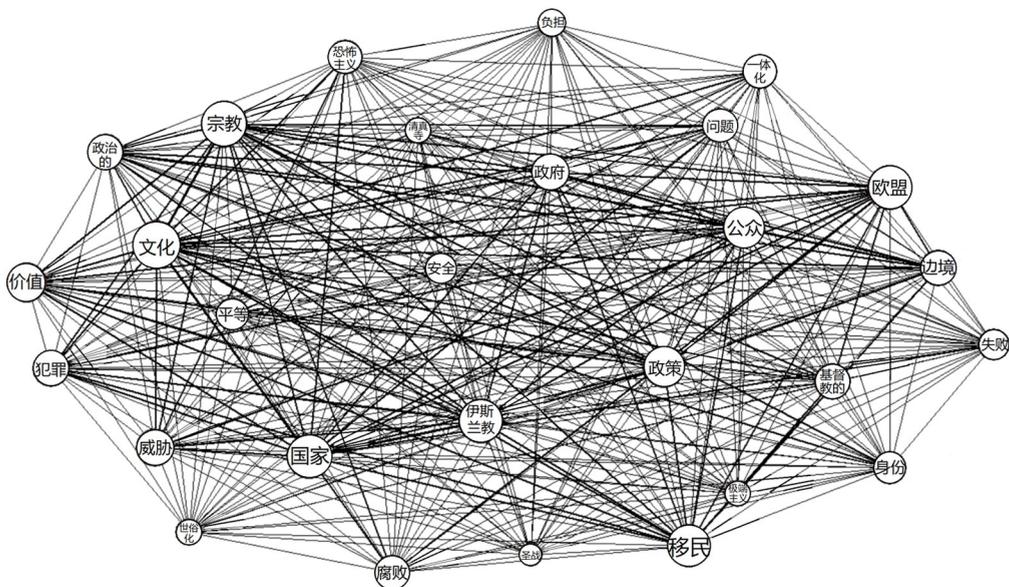
① 独立希腊人2012年竞选宣言,取自MPD数据库。

② 德国选择党2017年竞选宣言,取自MPD数据库。

③ Olivier Roy, “Beyond Populism: The Conservative Right, the Courts, the Churches and the Concept of Christian Europe,” in Nadia Marzouki, Duncan McDonnell and Olivier Roy, eds., *Saving the People: How Populists Hijack Religion*, Hurst and Company, 2016, p.186.

主义定位为“价值(观)”“文化”;第二类是与伊斯兰教、移民相关的词簇,例如“伊斯兰”“圣战”“移民”;第三类是针对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定位,例如“威胁”“犯罪”“极端主义”等。

图1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语义网络图^①



注:图由作者自制。

结合上文的语义情感分析,可以看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具有鲜明的二元对立色彩,而在这套二元话语体系中,“伊斯兰教”被构建为区别于“自我”、且对“自我”构成威胁的“他者”。此种话语构建方式并不新鲜,其承袭了近代以来以“东方落后论”为核心的传统东方主义与冷战结束以来以“东方威胁论”为基调的新东方主义叙事框架。有趣的是,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话语体系中,基督教与世俗主义均被纳入“自我”范畴,并被赋予相对正面的感情色彩。一些学者将大量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赞同世俗主义观念的现象称为“同性恋民族主义”,在这些政党重新定义

^① 图中“伊斯兰教”(Islam)包含同词根词“伊斯兰的”(Islamic)与“穆斯林”(Muslim),“基督教的”(Christian)包含同词根词“基督教”(Christianity),“政策”(policy)包含复数形式(policies),“文化”(culture)包含形容词形式(cultural),“移民”(immigration)包含同词根词“外来移民”(immigrant)、“移居”(migration)和“移民”(migrant)。图中选取同类词汇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作为代表。

的“民族”中,性少数群体是本土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自20世纪50年代民权运动爆发以来,流行于西方政坛的文化多元主义习惯于强调强势群体对性少数群体、女性、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的歧视与伤害,主张贯彻旨在保护后者的政治正确原则。当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批判并解构了此种话语体系,试图将政治正确原则抬升到“本土优先”的民族国家主义原则,强调所谓“弱势群体”并非清一色的受害者,包括性少数群体与基督教徒在内的本土民众共同遭遇外来穆斯林移民的威胁。比如荷兰自由党认为,穆斯林移民的大量涌入导致荷兰社会的恐同情绪显著上升,因此试图“捍卫同性恋,反对伊斯兰教崛起”,从而实现同性恋解放。^②

(2) 伊斯兰、欧盟与建制精英

在语义网络图中,与“伊斯兰教”一同呈现特别是距离该词较远的词汇包括“安全”“恐怖主义”“负担”“融合”“问题”等词汇(见图1)。在这些文本的构建下,穆斯林移民群体被集中形塑在“外来威胁者”的语境之下。通过分析这些词条及其与“伊斯兰教”和“移民”的语义关系,可以总结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突出三种议题导向,鼓吹“穆斯林移民威胁论”的三个理由。

首先,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设置社会融合议题,强调作为“他者”的穆斯林移民群体无法包容其他文化,他们往往会由于拒绝接受本土的价值观而难以融入本土主流文化;其次,此类政党设置安全议题,将恐怖主义与移民来源地区的宗教信仰相重合,进而将宗教政治化与安全化,鼓吹穆斯林移民给本土带来巨大的安全威胁;最后,财政议题强调安置穆斯林移民群体与减少其带来的所谓“安全风险”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给本土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构建有关伊斯兰教的话语体系时,英国独立党、奥地利自由党、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等少数政党将以和平稳定为主旨的温和伊斯兰与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宗教极端主义加以区分,而更多政党则煽动针对所有穆斯林群体的仇恨言论,甚至将伊斯兰教称为“一种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③

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的高关联词条还包括大量对于本国与欧盟建制的描述,例如“国家”“政策”“政府”“欧盟”等,以及针对它们的定位,例如“腐败”和“失败”。这些词汇不仅与“伊斯兰教”距离很近,而且很多词汇同时分布在“基督教的”和

^① Jasbir K. Puar, *Terrorist Assemblages: Homonationalism in Queer Tim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 Heike Schotten, “Homonationalism: From Critique to Diagnosis, or, We are All Homonational Now,”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8, No.3, 2018, pp.351-370.

^② 荷兰自由党2012年竞选宣言,取自MPD数据库。

^③ 荷兰自由党2012年竞选宣言和瑞典民主党2014年竞选宣言,取自MPD数据库。

“世俗的”周围。美国社会学者本弗德(Robert D. Benford)与斯诺(David A. Snow)的话语构建理论指出,政党与政治组织的话语构建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构建任务为诊断式构建(diagnostic framing),即识别当前社会面临的问题,并诊断引发问题的原因。^①如果说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构建二元话语体系、鼓吹“穆斯林移民威胁论”意在指出社会问题,那么将本国与欧盟建制元素纳入宗教话语则旨在开展归因探究。

通过对“伊斯兰教”的高关联词条和文本解读,笔者发现,各党大体上将上文提及的社会融合、安全、财政等领域的所谓“穆斯林威胁”归咎于两个原因:其一,本国的建制政党与主流精英过度强调多元文化主义与政治正确,放弃了社会融合与文化同化,从而为穆斯林移民的大量涌入创造了条件。例如荷兰自由党声称:“强调政治正确的一代精英们让荷兰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让成千上万的穆斯林进入了荷兰……其结果是灾难性的。”^②而且,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看来,多元文化主义过度包容文化异质性与多样性,“鼓励具有不同族群与宗教背景的社会群体保持自身文化的所有面向,而非融入主流文化”。^③如此一来,不仅穆斯林移民群体与本国原住民群体之间的隔阂加剧,而且这种隔阂引发的后果也成为“房间里的大象”,政坛主流声音往往对此噤若寒蝉。

其二,基于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边境开放与难民安置等安排,指责此类安排无视国家主权与本土利益。比如奥地利自由党表示:“自从申根区扩大和边境开放以来……经济难民和虚假寻求庇护者的涌入自2015年9月以来有所增加,导致奥地利面临外来人口犯罪的巨大问题,这也反映在伊斯兰恐怖主义等全新的威胁场景中。”^④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涉及欧盟的宗教话语构建中,欧盟建制本身并非唯一的指责目标,有关欧盟的批评常常伴随着针对本国主流精英的谴责。同一文本中,自由党进一步将奥地利穆斯林移民的上升归结于“欧盟与奥地利联邦政府均未做好实施都柏林规则的准备”。^⑤在另一份竞选宣言中,自由党的批判言论更富指向性:“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Österreichs)、奥地利人民党(Österreichische Volkspartei)和绿党很少保护我们的奥地利身份。他们正在与欧盟合作建立统一的国家 and 统一的人民。他们以错误的宽容和懦弱的态度对待激进的伊斯

^① Robert D. Benford and David A. 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6, No.1, 2000, pp.611-639.

^② 荷兰自由党2012年竞选宣言,取自MPD数据库。

^③ 英国独立党2015年竞选宣言,取自MPD数据库。

^④ 奥地利自由党2017年竞选宣言,取自MPD数据库。

^⑤ 同上。

兰主义,给人一种他们以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为耻的印象”。^①

综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构建宗教话语体系结构,将欧洲原住民与穆斯林移民之间关系置于“自我”与“他者”对立的立场上,强调基督教元素的目的并不在于认同传统的基督教建制与价值观,而是在于凸显外来宗教对本土文化的渗透与威胁。这些政党宗教话语的另一个突出叙事风格在于,通过采用极度负面的语言宣扬“穆斯林威胁论”,进而将其归结于欧盟与本国主流精英的政策失能。尽管文本中呈现的叙事模式充斥着大量混淆视听的不实论断,但并不妨碍这些话语实现其背后的目的,即抨击本国政坛的建制政党与主流精英。

三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构建:“抗议式动员”的行为逻辑

基于对各党宗教话语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出现了积极构建宗教话语但思想观念未见宗教化的矛盾现象,这也是此类政党将宗教工具化与政治化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在欧洲政治史上并不鲜见。在欧洲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中,兴起于19世纪且影响延续至今的政治天主教主义(political Catholicism)便是宗教工具化的一个经典案例。19世纪后期,在欧洲西部诸多民族国家剥夺天主教会权力的背景下,以德国中央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为代表的政治天主教主义政党曾以维护天主教会与教徒的权利为主要目标,并将天主教徒作为主要动员对象。然而,20世纪初,为扩大选票基础、增加选举优势,不少政治天主教主义政党逐渐淡化天主教色彩,自称代表包括新教徒在内的各派基督教徒。^②此后数十年,随着天主教会与政治天主教主义政党的分歧日益加剧,在一些欧洲西部国家,前者不再充当后者的支持力量,维护天主教会的利益也逐渐淡出后者的核心纲领。^③

有趣的是,当前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频繁使用宗教元素的主要目的,在于批评本国的建制政党与欧盟。作为一种动员手段,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构建逻辑与中东北非国家伊斯兰主义政党(Islamist party)为吸引“抗议式选票”而使用宗教话语有着某种异曲同工的效用。

^① 奥地利自由党2013年竞选宣言,取自MPD数据库。

^② Noel D. Cary, *The Path to Christian Democracy: German Catholics and the Party System from Windthorst to Adenau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5-34.

^③ Joerg Baudner, “Beyond Essentialist and Functionalist Analyses of the ‘Politicisation of Religion’: The Evolution of Religious Parties in Political Catholicism and Political Islam,” *Partecipazione e conflitto*, Vol.7, No.1, 2014, pp.111-132.

西方学术界通常认为,成熟的民主制度下,选民的选举行为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与经济因素。受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社会因素决定论强调社会结构与社会分裂影响选民的选举偏好,选民倾向于投票给政治纲领符合自身阶层或者族群利益的政党;^①心理因素决定论以密歇根学派为代表,强调对党派纲领与立场的认同等心理倾向影响选民的投票选择;^②经济因素论假定选民的选举偏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认为选民会基于政党的政治纲领与执政绩效进行成本—收益计算,选择预期效用较大的政党。^③无论是聚焦其中任何一种因素,还是研究三种因素的互动关系与共同作用,上述视角的隐含假设在于,选民出于某种因素赞成某一政党的纲领而投票给该党。

然而有学者发现,在一些民主化不成熟的案例中常常存在另一种选举行为,即“抗议式投票”,指为了反对现有政治体系或主流政党而做出的选举行为。根据这一逻辑做出的投票选择并非“因赞同而投票”,而是“因抗议而投票”。^④例如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东北非国家的混合政体(hybrid regime)时指出,由于执政者则常常利用行政资源遏制反对派,致使选举缺乏竞争性与公平性,许多选民倾向于将选票集中投给某个挑战执政党的反对党,无论是否赞成该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纲领,从而达到替换执政党的目的。鉴于这些国家政坛的大部分政党通常为世俗政党,伊斯兰主义政党常常通过构建宗教话语表明自身与包括执政党在内绝大多数政党的区别,并通过猛烈指责后者违背宗教原则的方式彰显自身对建制政党与现存政治体系的挑战者身份,从而吸引不满于现状的“抗议式选票”。^⑤这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选民是否支持政教合一、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是否投票给伊斯兰主义政党并无必然的相关关系;^⑥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为代表的一些伊斯兰主义政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后对于国家宗教生活的改变颇为有限。

^① Paul F. Lazarfeld, Bernard Berelson and Helen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② Angus Campbell et al.,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③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Harper Collins, 1957.

^④ Yilmaz Esmer, “At the Ballot Box: Determinants of Voting Behaviour,” *Politics,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p.91-114.

^⑤ Mark A. Tessler, “The Origins of Popular Support for Islamist Movements,” in John P. Entelis, ed.,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North Af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93-126; Chuchu Zhang, *Islamist Party Mobilization: Tunisia's Ennahda and Algeria's HMS Compared, 1989-2014*, Palgrave, 2020, pp.24-28.

^⑥ Michael D.H. Robbins, “What Accounts for Popular Support for Islamist Parties in the Arab World? Evidence from the Arab Barometer,” APSA Annual Meeting, Toronto, 2009.

笔者认为,抗议式投票不只存在于混合政体中,在民主化程度较高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选举逻辑。尽管欧美国家的选举竞争性程度较高,但近年来建制内政党出现了精英化与国家化的趋势。此类政党一方面在内部组织结构上陷入了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提出的“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困境,^①致使党内精英与基层党组织的隔阂日益加深;^②另一方面在功能上逐渐与国家同构,并成为确保“领导权在精英内部自行转移”的“统治机构”。由此一来,建制政党与社会日渐疏离,对基层社会的政治回应性不断衰减。^③

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的大量选民在抗议式投票的逻辑驱使下寻求替代性选择,并将目光投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等位于政治光谱边缘的非主流政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少量支持政治极化的选民可以获得与其人数不相匹配的选票力量。除了少数偏好意识形态极化的选民,许多选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原因并非赞成其具体纲领与政策,而是在于后者对规则、特权、精英建制与主流政党的批判与反叛。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增强动员能力的关键在于,通过刻画自身与主流政党的差异、展现自身的挑战者身份来迎合抗议式选票。

除了将讽刺与抨击精英作为一种拉选票的方式,^④笔者认为,近年来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日趋使用宗教话语,亦是其自我区别于主流政党、彰显批判性与反叛性的选举动员策略。如图2所示,欧洲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采用基督教话语,旨在通过建立“自我宗教文化”(本土基督教文明)与“他者宗教文化”(外来伊斯兰教文明)的二元叙事结构,从而区别于主流建制政党的政治正确话语。

自20世纪欧洲国家民权运动兴起以来,多元文化主义所主张的弱势群体权利保护、文化多样与包容成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重要诉求,政治正确也逐渐成为欧洲国家主流舆论界的一条基本准则。^⑤不仅如此,随着国际移民的不断增加,移民选票的力量显著增强。在移民人口较多的国家,主流建制政党为避免选票流失而失去议会大党地位,不仅极力避免出现话语偏见与仇恨言论,而且常常构建有利于少数族群的话语,

^①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Collier Books, 1962.

^② 赵卫涛:《西方政党基层组织建设初探:变局、挑战与应对》,载《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93-10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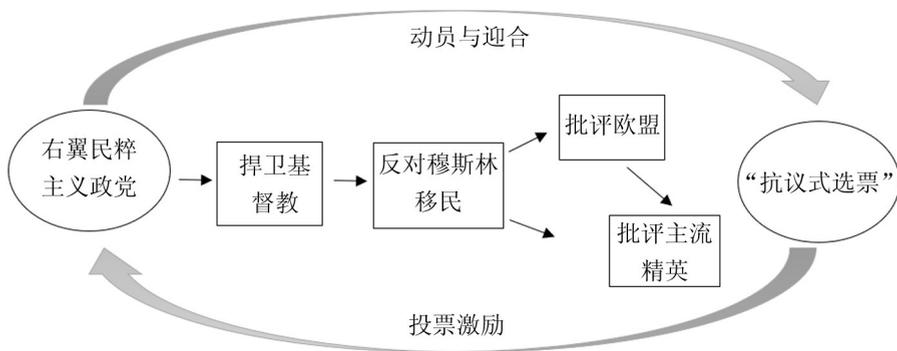
^③ 高春芽:《政党代表性危机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载《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102-111页。

^④ 佟德志:《解读民粹主义》,第14页。

^⑤ 祁玲玲:《选举政治的逻辑——美国反政治正确的归因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第69-72页;佟德志、樊浩:《美国“政治正确”的语义流变及其三重向度》,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第116-123页。

从而吸引移民群体的选票。不同于主流建制政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原本是欧洲国家政坛的边缘小党,并未将国际移民视为其重要的选举基础,而是将宣扬带有话语偏见的“文明对立论”作为迎合“抗议式选票”的动员手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凸显“敢言主流建制党之所不敢言”的同时,强调主流建制政党刻意回避移民群体及其宗教文化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因此陷入执政失能。

图2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与抗议式动员



注:图由作者自制。

由此一来,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构建的“二元对立”宗教话语实际上成为抨击主流政党与精英建制的一种“抗议式动员”。在此过程中,宗教元素发挥着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是否批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移民作为自身与政坛多数政党的重要区别,并刻意夸大与塑造穆斯林威胁论,谴责对此威胁视而不见、继续与欧盟合作的主流精英。例如,荷兰民主论坛进一步指责职业政客早已形成利益固化的“卡特尔型政党模式”,他们遵循政党利益至上,“将民众的利益置于次要地位”;^①荷兰自由党甚至强调自身因敢于发表批评伊斯兰教的言论而受到主流精英的打压与迫害。^②另一方面,运用基督教象征(religious symbols)、强调对基督教文明的捍卫有助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其偏见言论增添合法性。正如本弗德与斯诺的话语构建理论所指出的,强调某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符号、语言和宗教,往往能使话语发

① 荷兰民主论坛 2017 年竞选宣言,取自 MPD 数据库。

② 荷兰自由党 2012 年竞选宣言,取自 MPD 数据库。

挥更大的效力。^①

四 结论

基于对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近十年来的宗教话语构建研究,本文发现,尽管受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欧洲各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对待基督教不同教派、教会等宗教建制,以及特定世俗主义话题等问题的态度上有所差异,但各党的宗教话语构建呈现出较为相似的规律与逻辑。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日益偏好采用宗教话语进行宣传,并非宗教复兴与反世俗化潮流的结果。各党的宗教话语体系结构呈现出鲜明的政治目的,旨在将欧洲原住民与穆斯林移民之间关系置于“自我”与“他者”对立的立场上,通过反复渲染后者在社会融入、安全与财政等方面带来的威胁与挑战,抨击欧盟与本国主流精英面对此类威胁的视而不见与无所作为。一些研究指出,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在于构建“自我”与“他者”在两个维度上的二元对立:垂直层面本国民众与主流精英之间的对立,以及水平层面本国民众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对立。^② 本文进一步指出,水平层面的二元对立话语旨在构建“现实问题”,最终指向推动与加剧此类问题的“罪魁祸首”——主流精英,从而强化垂直层面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

作为欧洲各国政治谱系中的保守主义力量,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基督教民主政党组为代表的欧洲传统保守政党之间存在重叠的立场与理念,不过前者的话语建构逻辑呈现出自身的鲜明特色。就宗教话语而言,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话语构建过程中,宗教元素的使用既凸显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主流建制政党的差别,也起到强化话语合法性与说服力的作用。如此看来,对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而言,宗教的工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项研究也由此印证了贝兹(Hans-Georg Betz)和拜尔(Robert R. Barr)等学者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战略而非意识形态的论断。^③

^① David A. Snow and Robert Benford,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ed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1, JAI Press, 1988, pp.197-218.

^② 参见 Guy Ben-Porat et al., "Populism, Religion and Family Values Policies in Israel, Italy and Turkey,"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15, No.1, 2021, pp.1-23, DOI: 10.1080/13629395.2021.1901484; Daniele Albertazzi and Duncan McDonnell, "Introduction: The Sceptre and the Spectre," in Daniele Albertazzi and Duncan McDonnell, eds.,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1-14.

^③ 参见 Robert R. Barr, "Populists, Outsiders and Anti-establishment Politics," *Party Politics*, Vol.15, No.1, 2009, pp.29-48; Hans-Georg Betz, "Conditions Favouring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in Yves Mény and Yves Surel, eds.,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199-212.

根据中间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y),能否获得中间选民的支持往往成为候选人能否赢得选举的决定性因素,这导致主要政党极易出现政策温和化与中间化的倾向,政党之间的差异也逐渐缩小。^①不同于主流建制政党,遵循“抗议式选举”动员策略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政治极化的立场作为彰显自身与主流建制政党区别的重要手段,因而不仅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难以出现温和化趋势,而且或将在“抗议式选票”的激励下强化极化的立场。

本文发现,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构建与中东北非国家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构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基于后者的案例研究提出的抗议式动员理论同样适用于欧洲案例。二者的区别在于,许多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仅仅将基督教与世俗主义共同作为“自我”文化的重要组成,因而总体上对基督教价值观的认同低于伊斯兰主义政党对伊斯兰价值观的认同。传统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一种常见的研究路径是将基于西方国家案例总结的理论套用至亚非拉国家,进而根据其适用性进行理论的拓展与修正。本文的一个启示在于,将基于亚非拉国家经验总结的理论沿用至西方国家亦有可能产生重要的学术发现,这不失为一种值得继续探究的研究思路。

(作者简介:张楚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肖超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责任编辑:齐天骄)

^① 参见 Duncan Black, “On the Rationale of Group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56, No.1, 1948, pp.23-34;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al Action in a Democ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65, No.2, 1957, pp.135-150。